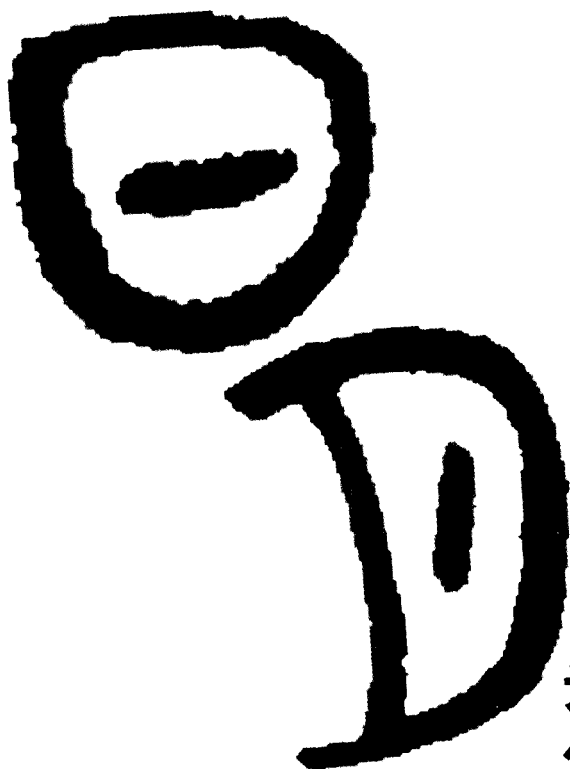


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作家的足迹



梁 永 安 主 编
Liang Yong'an



梁 永 安 主 編

Liang Yong'an

光
華
同
燦
爛

—— 復 旦 作 家 的 足 迹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光华同灿烂——复旦作家的足迹/梁永安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309-04711-7

I. 日… II. 梁… III. 复旦大学-校友-生平事迹
IV. G649.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1785号

日月光华同灿烂——复旦作家的足迹

梁永安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丹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7
字数 480千
版次 200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 100

书号 ISBN 7-309-04711-7/I·330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往往有几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复旦大学来说,有四个时期影响深远:1905年脱离震旦大学另立复旦公学,使复旦的根系挣脱了教会大学体系的束缚,迈开了自主的脚步。倘若没有这一艰难的从头起步,随着1952年中国教会大学的彻底消失,震旦烟消云散,复旦更无从说起。第二个时期是抗战西迁重庆,复旦在1942年由私立改为国立。表面上看,复旦从此离开了“民间”传统,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教育规范之中。然而在这一转变中复旦获得了经济上的有力支撑,使学校能够在大后方坚持下去,为民族培养急需的抗战人才。据《中华民国档案汇编》中的资料记载,仅仅1939年复旦大学的财产损失就高达五十四万余元,而同期的南开大学更是高达三百万元。对于财政拮据的私立大学来说,这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所著名私立学校分别在1942年、1946年改为国立大学。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复旦难忘的第三个时期,复旦汇聚了华东地区十余所高校的文理科精英,一跃而起,成为中国最高层次的大学之一。而此时,全国的私立大学一律改为公立,绝大部分拆解到其他高校。如果复旦仍为私立,恐怕此时也不免销声匿迹。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复旦迎来了发展期最长的第四个时段,这一时期里里外外的推进力接踵而至;1984年后进入少数几所国家基本建设大学的行列,世纪之交又迎来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时期。在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一波又一波大潮中,复旦总是得天下之先,临近百年之时,焕发出无限青春。



复旦的文学传统与创作起伏,与上述四个时期有密切关系。1905年筹备成立复旦的六个“干事”中,于右任、邵力子后来都是文学成绩斐然的名家。而后入复旦学习或任教的文学名流络绎不绝:任复旦公学校长的严复、进入复旦公学学习的陈寅恪、组织复旦剧社的洪深、在讲授文学的叶圣陶、翻译教学两不误的傅东华、诗人意气的刘大白……复旦的这种文学气象,得益于上海当时的特殊文化地位。五四之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出版业聚集于上海,引来了大批的文化人。复旦地处于此,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复旦文学家大多继承了“学者与作家”兼而有之的五四文化人特色,很多人从事文学创作,也进行学术研究。谢六逸、郑振铎、方令孺等人皆如此。这种风格也影响着稍后的一批人,使复旦作家都有些书生气。1926年进入复旦、1949年后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既擅长写小说,又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方面,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而在抗战时期西迁重庆之后,大批文化青年来到复旦。他们身处民族危亡的生死线上,行动大于思维,文学与学术语境大幅分离,呈现出更多的实践性与理想冲力。这一时期进入复旦学习的冀沄、绿原、邹荻帆,任教复旦的胡风、端木蕻良、储安平、曹禺等人,都有更多的专业作家气质。复旦在重庆的年份不算长,但这一时期培养的作家数量颇大,不少人以后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复旦文学的这一特殊阶段的丰硕收获,来源于抗战时期重庆的特殊地位。作为战时首都,大批文化人云集山城,为抗战宣传,为文化之火,为学术相传、也为文化人的生计,流离的青年与漂泊的文人都在复旦找到了一展身手的天地。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地缘”环境是:中国当时的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等,都没有搬到重庆,复旦在重庆的“聚集效应”自然放大。这也是历史提供的一个特殊文化空间。而在1952年后的复旦,已经是国家教育战略中的排头兵,万千学子心向往之,各地英才源源不断而来,其中的文学萌芽不可计数,理应作家辈出。然而事实并不



尽然,1966年前复旦培养的作家在中国作家协会与各省作家协会的名录中数量可观,但其中大部分是评论与研究者,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方面的大家并不多见。这种情况不仅出现于复旦,全国大学几乎都是这般状况。其中的重要原因,是1952年之后,高校的文学系科将主要的方向确定在培养研究与教学人员上,并不鼓励甚至压抑大学里的文学创作。在一切都被“计划”的年代,这种培养模式似乎理所当然,但与国际文学教育经验大不相符。美国及欧洲很多大学都有“Creative Writing”硕士学位,专力培养创作意义上的作家,成效斐然。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秩序大乱。大乱中复旦中文系破天荒地开设了“文学创作”专业,乱世中培养了梁晓声等小说家,也算一幸。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复旦陡然增加了一大批文学良将。仅中文系就收进了卢新华、张胜友、胡平、王兆军、李辉、张锐、李晓等十余位后来赫赫有名的创作人才。而经济系当时意想不到地成为复旦诗歌的高地,许德民等人创办的“复旦诗社”在中国校园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之后,复旦学生几乎代出作家,而且作家的创作风格和价值观念千差万别。这离不开复旦温润而多样的文学气候,几乎每一种文学种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开花的土壤。马骅、韩博、卫慧、素素……这些作家能出自一个校门,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自由的象征。另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更值得深思:很多复旦学人在学术生涯的丰收之年,却开始了散文创作的青春期。贾植芳、潘旭澜、吴中杰、葛剑雄、周振鹤、许道明、骆玉明……都在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获得文学界的热烈反响,形成了复旦的校园“创作圈”。更加令人注目的是,复旦越来越自觉地将创作视为自身发展的支撑点之一。1989年第一次开办了“作家班”,培养了虹影、凡一平等来自生活深处的青年新锐。近几年又引进了王安忆等著名作家,并开始招收以创作为主要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一个复旦文学的新时期,隐约可见。

回顾复旦的历史路径,文学是其中延绵不绝的篝火。为纪念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也为了这难忘的文学历程,这里编辑了《巍巍



学府文章焕——复旦作家作品选》和《日月光华同灿烂——复旦作家的足迹》两本文选。“复旦作家”既包括毕业于复旦的学子，也包含曾任教于复旦的教师。收入的文字，基本上按照复旦文学后浪推前浪的历史流脉排列先后。这两本集子所能包容的，仅仅是复旦文学的一部分。当我们再次抚摸这些复旦人的文字，再次回想这些复旦人风雨兼程的奋斗，不禁感慨满怀。其中的一些作家是我的师长，曾经给我难忘的教诲。记得是在1981年，中文系举办书法展，学生会派我去请朱东润先生写一幅参展作品。一进朱先生家门，只见他手提大茶壶，从楼梯上腾腾走下来，丝毫不像已经八十五岁的老人。我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问我什么时候来取。我说书法展明天开幕，今天就想带回去。朱先生顿时脸色一沉，严肃地说：“看来你中国化学得不好，不懂得礼仪。你这叫‘请字’，是件庄重的事情，起码要提前一个星期来说。一幅字写起来很快，我马上可以给你，但这不符合中国文化的道理。这样吧，看你来得挺急，三天以后来取。”听罢这番话，心里又惭愧又感激，连声向朱先生道谢。我的硕士论文导师潘旭澜先生、博士论文导师贾植芳先生都在晚年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发表了《太平杂说》、《狱里狱外》等有广泛影响的文化散文，作为学生一辈，深为他们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所鼓舞。这样的教育，只有来到复旦，在先生们身边才能获得。也正因为有这样复旦作家的不息奋斗，我们才能说：复旦，无愧于中国百年文学！

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在复旦下一个百年之时，会如何回顾自己的文学履痕？可以说，复旦今天所获得的发展能源，是历史以来最强的。社会与民族都对复旦有着巨大的关注，复旦秣马厉兵，正在进入历史的最佳位置。复旦如何为民族的人文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文学创造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期待着，我们责无旁贷！

梁永安

2005年9月于复旦园

目 录



上编:作家自述

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	赵景深
答王伟明问	绿 原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	贾植芳
发现如诗般的童话	叶君健
一个业余戏剧工作者的回忆	
——从“复旦剧社”到“戏剧工作社”	凤 子
忆《诗垦地》	邹荻帆
大学生活	冀 沅
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	潘旭澜
漫谈散文的情感之美——林非访谈录	林 非
校园杂忆	公今度
文学、电影、人生	梁晓声
《伤痕》之后	卢新华
发了芽的种子	王兆军
一九八二的故事	李 辉
唤醒沉睡的诗魂	许德民
校园花开	虹 影
性决不是我作品的卖点	凡一平 黄伟林
回忆复旦诗社:一九八六—一九九〇	天 骄

石子抛起来,又回到大地——从复旦园出发	龚 静
享乐主义者的“灵魂 SHOW”——与章元的对话 ...	卫 慧
邂逅的灵感给了《邂逅》	南 妮
诗歌应该包含批判性	韩 博
我在上海的诗歌少年生涯	马 骅
不死的块茎	胡展奋



下编:作家剪影

严复和复旦公学	严 名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
毛泽东与邵力子	孙琴安 李师贞
我所见的叶圣陶	朱自清
忆刘延陵	郑子瑜
方令孺和她的作家朋友	王 伟
洪深与“复旦剧社”	傅红星 王一岩
我的祖父青崖先生	李巨川
傅东华在一九三四年	李广德
余上沅与中国戏剧	陈衡粹
被误解的梁实秋	阿 滢
储安平与《观察》杂志	谢 泳
《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节录)	康 濯
曹聚仁的“三不朽”	
——写在曹聚仁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之际 ...	柳 哲
曹禺的复旦岁月	田本相
悼靳以	沈从文
萧乾与《大公报》	文洁若

陈翔鹤与《文学遗产》	陈开第
海峡破冰第一人	
——纪念台湾著名爱国学者胡秋原先生 ...	陈裴夏
回忆郑振铎先生	郭若愚
能文善武邵荃麟	陈梦熊 董德兴
王莹和中国救亡剧团	倪 迅
端木蕻良与萧军、骆宾基因何成仇	林敏洁
文化战士孙寒冰	郑兰荪
外圆内方谢六逸	秋 阳
梁宗岱:诗人的戏剧生涯	单世联
马彦祥与凌子风	余 之
念远方的沉樱	林海音
悲剧之子孙大雨	黄昌勇
走进夏征农	姚文滨
一代书家朱东润	周玉甫
记荻帆	曾 卓
人字的最后一画——记贾植芳	蒯乐昊 唐 毅
他就是王火	谢天开
王安忆:自己去摸索去走路	祖丁远
“驴友”葛剑雄:一位历史地理学者的精神之旅	孟 刚
《伤痕》和伤痕——小说《伤痕》发表前后	马 达
甘肃作家张锐	丁凯珊
素素《生命是一种缘》序	南 妮



上编：作家自述

谨以此书献给

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Fudan University

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

◎ 赵景深

鲁迅有两句有名的诗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说明他是爱憎分明的。对于青年也是这样。倘若这青年是可以造就的，他总是无微不至地指导他；一旦这青年走错了路，他就对这青年予以教育；如果这青年又变好了，他也会帮助这青年的。我就是曾经受过鲁迅指导的一个青年；后来也受过鲁迅的批评和教育；最后鲁迅又和我通信，并且写稿子交给我主编的《青年界》发表，这时已经是鲁迅逝世的前二年即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了。

鲁迅与我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大部分记载着，但也有他漏记的。如我第一次同他见面，就为《鲁迅日记》所不载。

那是一九二七年春天，鲁迅刚到中山大学不久，住在钟楼上。我由于郑振铎的介绍，到澎湃同志的家乡海丰去教书，路过广州，住在长堤的旅馆里。这时同住旅馆的一位青年，是从浙江大学闹风潮出来的，我已忘记了他的姓名。他仰慕鲁迅，想考中山大学的理科插班生，但考期已过，他希望能因补考入学，要我问一下鲁迅，是否可以。我虽只是在《语丝》上同鲁迅通过一次信，也就贸然地替他去访问了鲁迅，自然一方面也怀着敬仰的心情，想一亲鲁迅的颜色。记得我告诉传达处，说我是从上海来看鲁迅先生的。这样，远地来访，传达处就替我通报了。谁知我去得太早，鲁迅还没有起床，这使我很不安。我看那地方很朴素，没有什么摆设，只有桌子和椅、凳。同住的还有两三个人。排床紧挨在一边。这就使我感到鲁迅待自己是不讲究排场的，我很佩服。鲁迅掀帐而起，同我谈话，我报上了姓名，说明来意。鲁迅说，须遵照中山大学的规章制



度,不能过期补考插班。我只好告辞。回到旅馆,将访问的经过告诉那位从杭州来的青年,恰好海丰中学校长郑师许到旅馆来看我,我便介绍那青年到陆丰中学去教理化,这样边教边学,那青年总算有了着落。我这像是“杨树达的袭来”,至今想起,犹觉冒昧。

一 鲁迅指导我研究民间故事

我在海丰中学教了半年语文,就回到上海。当时章锡琛本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妇女杂志》的,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因为过去我在学生时代,常译安徒生的童话给《妇女杂志》刊登,因此这次章锡琛就约我到宝山里新创办的开明书店当了第一任的编辑。在鲁迅回到上海来的时候,夏丏尊也已到开明书店任了编辑。十月五日,章锡琛、夏丏尊、我和张梓生就到共和旅馆去访问了鲁迅,没有遇见鲁迅,因为这天晚上李小峰正邀请鲁迅到全家福去吃饭。

过了一星期,十月十二日,鲁迅到开明书店去看章锡琛,遇到夏丏尊和我。当时我在《文学周报》写了一篇短稿《鲁迅的祝福》,鲁迅看见了,说我写得不错(记得这是我在海丰回家途中,在汕尾买到《彷徨》,就在旅馆里把这本书看完。后来这篇文章就收在《文学讲话》里)。我听了鲁迅的称赞,很高兴。

十月十八日晚上,章锡琛请鲁迅在共乐春吃饭,当时章锡琛请的陪客有江绍原夫妇、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樊仲云和我。席终我表演了一个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因为忘了戏词,就只好叽哩咕噜。鲁迅听后说,现在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哩咕噜”的。意思是说,各用心机,不能开诚相见(后来鲁迅说见陌生人酬应,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我的相声,被鲁迅一题,就有了新的意义,我也是很高兴的。

一九二八年,我辞去开明书店编辑职务,专为开明书店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并编《文学周报》,还在立达学园教了“文学概



论”和“文艺思潮”各一小时。七月间，徐霞村编《熔炉》，还有胡也频等人参加。一天下午，徐和我到横浜桥景云里向鲁迅索稿。鲁迅说是我们“突来索稿”。因平时我们同鲁迅没来往，鲁迅不知我们的倾向如何，当然不会答应给我们写稿子的。

同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到景云里去看鲁迅。因为我看了小泉八云的《几个中国鬼》（此书收在英文本《近代丛书》），作者是介绍中国民间故事的。这书里有一篇《大钟的灵魂》，这故事在谭勒的《中国民俗学》里也引用过。据说这传说见于俞葆真的《百孝图说》内。谭勒《中国民俗学》大意云：“明永乐皇帝造北京大钟寺，kuan-yu 奉命监造，两次均未成。将获罪。女 ko-ai 年方十六，甚孝，忧而问于占卜家，据说铁内须加入未嫁女子之血。至造钟日，Ko-ai 奋身投入铁炉，父救之，仅得一鞋。后钟造成，居民常闻钟声凄切，如泣如诉，似云：‘咳，咳！鞋，鞋！’”我因鲁迅的《朝花夕拾》里曾提到过《百孝图说》，便将刊登我介绍《小泉八云谈中国鬼》这篇文章的《文学周报》送给鲁迅，一面就向他借这部《百孝图说》。鲁迅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并托张梓生将他所藏的书借给我。张梓生前几年曾在《妇女杂志》回答过我关于童话的几个问题。

现在《鲁迅书信集》已经出版。鲁迅给我的第一封信见第 211 号，信上说：“顷检出《百孝图说》（已是改订版了），投炉者只有李娥，但是因铸军器而非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今将全部奉借，以便通盘检查——那图上的地下，明明有许多军器也。”

上个月陈汝衡送给我一部《百孝图说》，他这部是“同治辛未（十年，一八七一）河间俞氏作刊”，可能同鲁迅所藏是同一个本子。我又重检了一篇，的确投炉的只有三国吴李娥，见卷四（上册页八），大约与《大钟的灵魂》只是类似的故事。

隔了四天，我将书还给鲁迅先生，他又复了我一信云：“见还的书，收到了，并信。外国人弄中国玩意儿，固然有些渺茫，但这位《百孝图说》作者俞公，似乎也不大‘忠实’的。即如‘李娥投炉’，他引《孝苑》；这部书我未见过，恐怕至早是明朝书，其中故事，仍据古



书而没其出处——连字句大有改窜也说不定的。看他记事,似乎有一个沟渎,即因李娥事而得名。所以我想,倘再查《吴地记》(唐陆广微作)、《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作)、《太平寰宇记》(宋乐史作)等,或者可以发见更早的出典。”(212号,页201—202)不顾鲁迅的谆谆教导,我竟偷懒,没有到图书馆里去查,有负鲁迅的盛意(方才我查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李字部分,没有查到以李娥为地名的地点)。

我那本《民间故事研究》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出版的,其中收有《小泉八云谈中国鬼》,我将鲁迅给我的第一次信和《百孝图说》中《李娥投炉》全文都写在序里,并在序文末尾说:“我应该在这儿感谢热心诱掖的鲁迅先生。”这序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的。就在这一天将书送给鲁迅先生,他在日记里记道:“午收赵景深所赠《中国故事研究》一本。”实即《民间故事研究》。

接着就是同年鲁迅编《奔流·托尔斯泰专号》的事情。我投了一篇托翁长子写的《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他很慎重,向我讨了原刊物去看,可见他编辑刊物负责和认真的情况。他还说:“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他把我告诉他的英、法纪念托尔斯泰百年祭的情形都收集在《奔流·托尔斯泰专号》的后记里。这篇后记也收入了《集外集》。

过了一年多,就是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这是我与李小峰的妹妹希同结婚的日子,鲁迅也来庆贺,他写日记道:“下午雨。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

二 鲁迅对我的批评和教育

一九三二年鲁迅在《二心集·风马牛》里批评我的翻译论,又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了《教授杂咏》第二首。我将 Milky Way 误译为“牛奶路”(应译“银河”或“神奶路”),将 centaur 误译为“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是我没有多查字典、工作不严肃的结果,是应该批评的。



至于我的翻译主张,是由于我写了一篇《论翻译》,其中有几句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哒……其害处当与误译相差无几……所以严复的信、达、雅,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我认为信还是重要的,不过比较不太重要而已。其实我只是迁就读者,我这种翻译主张是不对的。鲁迅认为信是最主要的,“不能完全中国化”。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当时我并不是反对鲁迅所译的科学文艺理论;我在《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讲话》中都大量引用过鲁迅译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恐怕鲁迅不仅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国民党市政府的一个宴会上说错了话而批评我。我没有加入左联,虽然在《现代文学》上偏重革命派的著作,但也刊登颓废派和别的派别的著作;虽然这刊物只出了半年六册,就被国民党禁止,究竟还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革命分子,不是对于革命文艺非常热爱。总之,这段时间内我走了下坡路。

三 鲁迅逝世前两年对我的帮助

后来在我主编《青年界》期间,写信给鲁迅,有如下这些日期: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五日、二十八日,十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三十日,五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三日。鲁迅最后的两年我共去了九封信。当时我不知道鲁迅病重,去信的有两个,其一是为我主编的《青年界》索稿,又其一是向鲁迅解释翻译问题,我承认了自己看法错误,认为鲁迅连语法也几乎照样,可以由于翻译使得中国写文章的语法和修辞更缜密、更进步。

鲁迅终于替我主编的《青年界》写了两篇稿子,一篇是一九三四年的《忆刘半农君》(收入《且介亭杂文》),还有一篇是《陀斯妥夫斯基的事》(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原文是用日文写的,刊登一九三六年二月号东京《日文文艺》杂志,由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先刊《青年界》月刊九卷二期,同时又刊《海燕》月刊第二期。